

## 走向“新人文”

由于近年来对于知识考古的关注，自然会将这种视野和方法引向投身其中的新闻教育领域的考察。改革开放以来，特别是21世纪以来，新闻教育面临来自新技术的全面挑战。这里想讨论的是，知识考古学（特别是媒介考古），对于新媒体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教育改革而言，会有什么建议？

事实上，以知识考古看来，新闻教育的发生和衍变，是一个以媒介及其实践为基底而展开的知识累层过程。这一表述有两层含义：一是百年来中国新闻教育的衍化的基本逻辑之一是媒介逻辑。也就是说，以不同的媒介实践为生发而展开，并获得合法性的。最表层，也是最直接意义上的是，从报学、电影学、出版学、广播电视学乃至当今的互联网。这个建构主要在三个方向：技术体系、组织形态和操作方式（实务）。二是各个媒介的逻辑和实践伸展均有相对自主的空间，构成某种知识型，相互之间并非简单的替代、递进甚至线性的过程，而是一层一层的累积交错的过程。这构成我们当前的新闻教育的格局，也是我们的问题和挑战所在。正如媒介考古学所理解的，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，都意味着断裂、冲击和剧痛。对于新闻教育而言，涉及方方面面根本性的调整。不论是由此带来的外部环境还是自身知识体系的创新，都构成压力，都需要自我革命。

从考古学的视野看，探究数字时代的新闻教育，不是以某种理论去预测未来，而是通过实证性的描述，返身至过往的累层之中。也就是说，在新媒介与旧媒介之间建立新的关系，站在新媒介的位置重新理解过往的媒介，由此重新观照当下和未来。这种致思方向对于理解数字时代的新闻教育带来了诸多助益。这要求我们在数字化教育的时候尤其要注重旧媒介教育的知识体系。如果持一种媒介史的线性观念，那以往的媒介及媒介教育或新闻传播教育就没有什么价值，因为现在的才是最完美的。新媒介也赋予了旧媒介一种新的价值。新闻教育的问题，也许不是纯粹以一种数字技术去建构一个未来的问题，而是要在数字媒介、印刷媒介、电影、书籍之中建立新的联系，找出其中的裂缝乃至断裂。也正是如此，越数字化，越要珍视前数字化时代媒介的价值。

如何理解数字时代新闻教育的人的养成？这关乎当前新闻教育的根本旨趣。从考古学的视野，主要涉及媒介与人的关系问题。对此问题，学界有了太多的讨论，在此不再赘述。在这里提出一个“新人文”的观点。“新人文”是相对于古典的人文主义而言。古典的人文建立在言说、手写乃至印刷的媒介基底之上。如中国的人文传统，建立在六艺（诗、书、礼、乐、射、御）的基础之上，君子的养成是基本目标；西方的人文传统则有如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，背后有一套说、写和思考的自我技术。“新人文”则将人的塑造建立在技术媒介和数字媒介基础之上，通过建立批判的、异质的、距离感的新闻教育，重新调整人与媒介的关系。

这种新人文，反对人成为技术的牢笼，也非排斥新技术如算法、虚拟现实等新技术，而是在认知其原理和基本偏向的基础上，协调人和新媒介之间的关系，使技术为全面而健全的人的形成发挥积极的助益。第一，在对待算法时候，也许更应该与旧的媒介及其知识型重建新的关系；而不是将其作为落后的、过时的、无用的包袱而丢掉。殊不知，从媒介考古的层面而言，在推动所谓数字新闻智能媒介的时候，我们更应该注重基本的读写能力、思维能力，这是旧媒介沉淀于人的根本性的东西。第二，诚如海德格尔所言，现代技术已经是庞然大物，无可逃避。虽然我不反对大家掌握算法技术，会编程，或者更为复杂的技术操作。但是，一定要明确这样做有何文化意义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保持警觉，我们的课程设置，老师们的教学，如何与其保持距离，具有某种批判性和反思性。第三，如何在变革之中确立要以人的问题为旨归的总体意识，这是当前的一个考验。对于新媒体时代如何重建人的主体性地位，诸多媒介学者提供了不少高见。从麦克卢汉关于艺术对人的救赎，到尼尔·波兹曼的“爱心斗士”，海德格尔的“诗与思”，福柯后期从知识考古学转向主体的系谱学建构，基特勒晚年返回到古希腊时期的神话中寻获意义，如此等等，无不是从正反等方面去寻找人的确立之道。所谓的新人文，就是要求要在旧有的话语和知识累层之中寻找意义，为人重新赋予意义。也就是说，新闻教育者要对现存的东西进行抵抗，而不是向媒介投降。正如基特勒在其成名之作《话语网络》中所言：

进步的教育者只能与媒介竞争。

唐海江

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